■新世纪论坛

解放思想 要抓住焦点

□沈宝祥

2004年，是我们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改革和建设，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关键一年。开创新局面，首先是思想要进一步解放。

从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一次思想大解放正在深入发展。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不断解放，也积累了推进思想解放的重要经验。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推进思想解放要抓住焦点。

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实践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解除了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一次大解放。改革开放发展到1992年，“姓资姓社”的争论使人们疑虑重重，迈不开步伐，不敢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力地破除了凡事要先问姓资还是姓社的“左”的思维方式，迅速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长时期来，人们习惯地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改革中，不敢触动计划经济体制，更不敢大胆运用市场机制，邓小平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下破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束缚，为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个体和私营经济等非公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姓公姓私”的疑虑成了推进改革的一大思想障碍。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非公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组成部分”论解开了“姓公姓私”这个思想扣子，有力地推动了非公经济的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发展观，击中了为GDP而生产、为显示政绩而生产等片面、非科学发展观的要害，使人们的思想进入了新的境界。

自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来，思想解放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打破了某一种习惯势力、传统观念，或主观偏见的禁锢和束缚，使人们的思想有豁然开朗之感，精神上有一种砸烂枷锁、放下包袱的轻松感。

思想解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所说的思想解放，是指某一事物在历史进程中渐进式地发展到一定时候，需要向前跨越一大步，而人们的思想却落后于现实，被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习惯紧紧地束缚着，视之为天经地义，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自觉或不自觉地设置禁区，不许或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时，一些坚持改革、思想敏锐的人便遵从群众的意愿，适应事物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某一理论观点，揭示旧的思想观念的谬误性，使人们在思想上分清是非，跳出老框框，出现飞跃，精神为之一振。

推进思想解放，关键是要抓住焦点。首先要抓准阻碍历史前进的旧思想观念的要害，并加以概括，同时要提出能够破除这种旧思想观念的正确思想和理论观点。这就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并且要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对各个领域的状况和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抓住焦点，只是泛泛而论，即使是大声疾呼要解放思想，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对解放思想提出的总要求，我们要以此为指针，结合自己的实际，抓准问题，推进思想解放。

有些领域的改革，讲了很久，但进展不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思想解放还不够，没有能够抓住这些领域阻碍改革的思想症结，形成焦点，以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有效地加以破除。在这些领域，思想观念上究竟要破什么，立什么，还不大清楚，一些旧思想、旧观念，特别是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影响，还没有在一定深度上触动。这也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改革的决心。

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深化改革，首先要在推进思想解放上下功夫。为此，总结一下二十多年来思想解放的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党史札记之七十二



听毛泽东谈哲学(二)

王： 谈到这里，还没有谈到这次接见的主题。

龚： 主题原来以为就是写文章。毛主席好像就要转到写文章的事了。他说：

材料收到了。提纲看了一遍，其他来不及看。

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如何讲，马克思主义如何讲，修正主义如何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它讲原始积累那部分。

这时，康生插话，说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可能比现代修正主义的高明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过这个话茬，说：

斯大林感到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就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不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谈军事。

第三国际还没解散，我们就不听他的。遵义会议就没听，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作出决议，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左倾”教条主义，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在农村十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和阶级关系。不是到了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年工夫，才搞清楚。二七年以前，搞农民运动讲习所，搞调查。在我家乡，找贫雇农，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

王： 这是什么意思？

龚： 这是骨牌，又叫天九牌，三十二张牌，分三个系列，一个系列为“天”　毛泽东说的是这个系列中的七种牌的名称。湖南农村的人常玩这种牌，我是湖南人，一听就懂，所以能纪录下来。

毛主席说：

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老是输，输一两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元，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长沙开兵来剿灭了。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当地豪绅开会，杀了两个贫苦农民示众。有个农民领袖躲来躲去，躲到山里，还是捉去杀了。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要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为文学家，还实验过电。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推举的？自封的。后来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动物。动物发展至少经过几万万年才生出人的头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就不信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猴子里面又只有过去那么一种猴子能进化，其他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马、牛、羊、昆虫，要变。动物是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头几行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傅鹰说，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的。几千万年，逐步变成水。水也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才有可能两种元素化合成水。想找他谈一谈。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

文章写半年一年都可以。

王： 跑了一大圈野马，话题回到写文章的事了。

龚： 马上又谈开去了，谈了他对哲学几个基本范畴的见解。关于分析和综合，关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肯定否定，关于自由和必然，关于无限可分。

毛主席说：

历来讲分析、综合，没讲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与农民，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

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我们有什么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军队数量是一百二十万，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农业，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都是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我们联系群众，他们脱离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个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教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一位去问他父亲，他父亲说，你不要问，将来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人人信，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没受他影响。《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没受影响。

执政为民理念 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牟宗艳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胡锦涛，《七一讲话》）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始终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所以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同时，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坚持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执政为民理念的形成，就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创造性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

第一，执政为民体现了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有机结合 。执政为民的提出，首先是基于执政党建设的迫切需要。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党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要求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在深刻把握政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了新的路径。执政为民理念的形成，也是我们党以高度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成果。它内涵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体现了我们党自觉把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置于人民群众当中，把执政的合理性基础置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执政为民的过程，是我们党通过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没有对客观规律的把握，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能把党的执政意识贯彻到具体的工作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党自身建设也将成为空谈。所以，执政为民理念的形成，既是对唯物史观群众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

第二，执政为民实现了唯物史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唯物史观的真理观和价值观是互为前提、互相贯通、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真理观，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在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趋势基础上，弄懂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懂得如何处理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从而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毫无偏见，大公无私，尊重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又总是强调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这两个出发点之间的关系，就是真理观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在执政为民的理念中，真理观和价值观得到有机结合。它首先鲜明地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取向，体现着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另一方面，执政为民，把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又体现着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的认识。

执政为民理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的统一，坚持人民作为价值主体和历史主体的统一，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这种统一的目标。

第三，执政为民突出群众利益问题，赋予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以鲜明时代特性。执政为民理念的提出，坚持、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理论，赋予这一理论以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时期党的政策和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反复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这都说明在执政为民的理念中，包含着我们党适应我们自身历史地位和执政条件的发展变化，适应我国人民利益要求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自觉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党的价值实践结合起来，突出了实现群众利益在实践党的群众路线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尊重人民利益是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重要表现，坚持和发展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

第四，执政为民使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具体化、可操作化。人的全面发展是执政为民的终极目标。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一个高度综合的问题，虽然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但它已经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要求。我们不可能离开社会的全面发展抽象地谈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也不仅只是一个价值指向问题，而是一个很具体的社会实务。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统一的，具体体现在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等各个具体方面，这些都是执政为民的题中应有之意。

执政为民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并把这一目标贯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十六大把这一目标在现阶段具体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把这样一种发展观具体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五个统筹”是总结20多年的经验、适应新形势提出的，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国机械装备(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 Equipment Corporation Group
CNMEG
电话(Tel):86-10-68595793 传真 Fax :86-10-68521569
网址:Http://www.cnmeg.com 电子信箱:office@cnmeg.com

■理论动态

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张琳

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华侨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福建省委党校联合发起的“2003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年会暨全国党校系统哲学年会”于近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华侨大学举行。年会讨论了当前学术界的许多前沿和热点问题，其中最为集中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回到马克思”的问题。与会代表围绕“回到马克思”是否可能、应当在何种意义上“回到马克思”，以及如何看待和处理“回到马克思”与“读懂马克思”和“回到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指出，“回到马克思”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要回到它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有的学者指出，“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现实生活”，而是否“读懂马克思”，不是由某个人或什么权威来决定和回答，而应由实践，由生活本身来回答。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问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都以超越物、心，主、客二元对立为特征，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交流、对话，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第三，关于当代中国的思维方式变革和现代转换问题。有的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传统的求同、求稳和单向性思维方式等，越来越约束着人们的思想，限制着人们的创造力，因此，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创新，实现从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辩证思维方式的转换。有学者提出，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在当下，迫切地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阶级和阶层、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的认识转换上。此外，有的学者还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的变革等问题发表了有启发性的见解。

与会代表就如何把握和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发表了看法。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的把握，要从基本精神和根本目标出发，要区分思想层面的前沿问题和实践层面的前沿问题。其次，对于前沿问题的把握，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是经验化和碎片化倾向；二是搞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式的研究。再次，关注前沿，并不意味着要丢掉传统，特别是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

与会代表还就如何做到理论创新以及理论创新应把握的原则进行了探讨。代表们强调，理论创新首先要注重精神实质和思想交锋，而不单纯是新名词和概念的引进和转换；理论创新要有历史感，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是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理论创新要关注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尤其要注重和现实的联系，不能搞纯文本、纯理论研究。

第十一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与佛山科技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十一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于近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著名专家龚育之、石仲泉等参加了研讨会。

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会者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运用和发展，又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他的大量科学著作都富有哲理性，尤其是《反对本本主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许多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了科学的概括。这些著作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历史，但贯穿其中的思想方法和阐述的哲学理论，将会长时期发挥着作用。

（张俊国）